

冷战后中澳政经关系影响测量

——建构主义视角的解读

刘震键

【摘要】从冷战结束之后的 20 多年的中澳关系历史可以看出，无论双边政治关系如何震荡，经贸整体上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本文便在此定性特征的基础上，用定量方法验证了中澳经贸起伏较少受到双边政治关系影响、与世界经济大趋势相关性较强的看法。进而本文尝试采用建构主义对于中澳政经关系特征进行解读。具体的考察路径选取了结构层次和单元层次：在结构层次上看，中澳两国在新的体系文化下是如何内化体系文化而确定自身国家的定位；在单元层次看，中澳两国是如何在冷战结束后的多边场合和双边场合解决矛盾、互相增进对彼此利益和关切的理解。综合两个考察路径，本文认为中澳政经合作特征背后的原因是理念主导的，即中澳之间已经摆脱了“霍布斯”式的你死我活的互动模式，也并非“康德”式的朋友关系，两国关系定位应为“洛克文化”下的竞争关系。

中澳日益增强的贸易纽带“似乎”在改变国家外交选择，两国自从 1972 年建交以来，很长时间内双方都未把对方作为战略攸关国家。而自从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近 10 年，中澳关系的定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澳大利亚的自我定位是中等强国，中国则势必发展为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大国，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中澳合作的现状是什么？影响中澳合作的重要因素是什么？中澳双边关系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这三个问题互为逻辑地指引着本文探寻中澳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笔者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在回答新阶段的中澳关系具有更大的优势。“国家利益论”、“国际制度论”、“经济相互依赖论”等缺乏了对于中澳关系中观念和身份构建的这些深层次问题的探讨，这也是中澳经济关系密切之后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澳研究需要引入一种明确的社会学视角。

一、中澳政经关系发展概述

（一）中澳经贸发展的起伏

描述冷战后中澳经贸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阶段从 1991 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到 2000 年，第二个阶段从 2001 年至 2011 年。中澳双边经贸二十年间年均增幅达到 22.2%，前十年年均增长率为 14.87%，低于平均值；后十年年均增长率为 26.5%，高于平均值。中间呈现负增长的年份只有 1998 年，呈现低于 10% 的低增长年份为 1995、1997、1998、2001 和 2009 年。

表 1 1991-2011 年中澳经贸增长率^①

年份	增长率	年份	增长率
1991	30.77%	2001	6.44%
1992	10.42%	2002	15.99%
1993	29.07%	2003	29.96%
1994	30.90%	2004	50.34%
1995	6.88%	2005	33.63%
1996	21.28%	2006	20.91%
1997	3.84%	2007	33.08%
1998	-5.15%	2008	36.06%
1999	25.47%	2009	0.72%
2000	33.94%	2010	46.61%
		2011	32.34%

1991 年 2 月，随着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取消对华的制裁，中澳关系恢复正常。由此开始两国拥有了经贸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第一个十年的成绩显著。

1991 年双边贸易额只有 21.12 亿美元，到 2000 年已增长到 84.53 亿美元，增长超过 4 倍。年均增长率达到 14.87%，超过了同期两国的 GDP 的增幅。其中中国出口由 5.54 亿倍增到 34.29 亿，进口则由 15.58 亿倍增到 50.24 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附表略）。整体上看，中澳之间贸易中国一直处于逆差的状态，两国这十年的贸易额除了在 1995 年、1997 年和 1998 年录得低于年均增长率外，其他年份都在双位数以上的增长（具体数据详见表 1）。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中澳贸易突破百亿美元、千亿美元大关。2001 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 89.97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只有 6.44%，这在中澳经贸增长上算是一个小的低潮，但此后除了 200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贸易数据飞速增长，年均增长 26.5%，在 2011 年达到了的 1195.73 亿美元这样一个破千亿的数字。除了 2011 年以外，还有两个里程碑似的时间点值得注意——2002 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了百亿美元，2004 年又再翻番突破了两百亿美元大关，显示了强劲增长势头，其增加幅度非常明显，进口额与出口额分别提高 41% 和 58%（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附表略）。澳大利亚外交部在 2009 年 11 月 30 日的统计报告中显示中国与澳大利亚外贸总量已经超越日本和美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伙伴国。而澳大利亚成为我国十大贸易伙伴国之一。^②

^①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1 年数据计算得出

^② 于洋：《中澳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云南财经大学，2011 年，第 24 页。

（二）中澳政治关系的起伏

1991年中澳关系恢复正常，双方政治关系在笔者看来可以客观评价为良好。其后延续至今经历了基廷（Keating Paul John）、霍华德（John Winston Howard）、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和吉拉德（Julia Eileen Gillard）四任政府。基廷政府时期总体友好，1993的访华是任内中澳之间最积极的因素；霍华德政府期间双边关系经历了“两落两起”——两个低潮指1996年和2000年前后的两次台海危机，两个恢复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为1997年霍华德的首次访华和2003年胡锦涛主席的首次访澳；陆克文政府时期经历了2008年两度访华的“蜜月期”和2009年“可怕的一年”；吉拉德政府时期双方关系更加成熟，总体友好。

二、中澳政经关系影响测度

通过回顾中澳政治关系和经贸发展的起伏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即中澳之间政治起伏与经贸变化存在着明显的不协同性，通过进一步的比对，本文在此提出一个观点——中澳之间经贸起伏受双边政治因素影响小，而主要是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这是中澳政经关系上一个明显的特征。相较于中国与其他大国比如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中澳政经关系上的特征摆脱了政治因素严重影响贸易发展的规律而存在独特的性质。

（一）中澳政治关系起伏与中澳经贸变化相关性弱

中澳双边关系起伏与中澳经贸变化的相互影响弱，即是说明即使中澳政治关系处于低潮，但其增长率仍不低。本文先采用特殊年份的例证来说明，接着会再用定量分析进行补充验证。

1. 例证分析

前文提到，中澳双方政治关系在常态下可以客观评价为良好，这即是1991年后中澳关系的初始状态。从上文中澳双边关系回顾中笔者提取了1996年、2000年和2009年这三个特殊的年份进行进一步政经关系分析。

1996年前后的台海危机，使得中国政府决定暂停双方部长级以上的交流，双方关系降至1989年以来最低点；2000年前后的另外一次台海危机，同样使得双方政治关系的“来自中国的高层访问的相对减少”；2009年澳方一系列不友好的举动，使得李克强副总理推迟访澳，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取消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的计划。由于政治事件对经济形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本文需要考察的相应的经贸数据应该是1997年、2001年和2010年，实际数据为3.84%、6.44%和46.61%。数据上看前面两个数据是低值，而2010年的数据则相反是一个历史的高位。三个考察的样本有一个不符合本文的假设，那么本文可以认为“中澳双边关系起伏与中澳经贸变化相关性强”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而实际上1997年和2001年的贸易低位正是与国际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这在下文继续分析。

2. 定量分析

例证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本文的假设，但可能不太全面，定量的分析或许会让本文更加直观地看到中澳政经关系的弱相关性。众所周知，两国间政治关系一直是国家间关系研究主要领域，但是如何对政治关系的起伏进行量化是一个难题，为了能够方便中澳政经关系相关性，笔者借鉴了国内其他学者普遍采用一

个度量指标——双方高层的会晤次数。具体到中澳之间，本文选用的是中澳高层每年会晤次数的数据，统计数据如下表。

表 2 中澳高层历年会晤次数^①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	3	3	7	7	5	8	4	9	4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6	6	7	4	6	8	5	8	6	6	7

将每年高层会晤次数与每年的经贸数据进行相关性的函数计算，用 Excel 软件对两对数据取 CORREL 函数。具体得到的结果：1991-2011 年计算结果-0.076，1991-2000 年计算结果-0.193，2001-2011 年计算结果-0.222。在这个函数中±0.3 之内都属于微正（负）相关的关系，^②因此本文可以得出双边政治会晤频率跟经贸关系没有很强的相关性。

（二）中澳经贸变化与世界经济形势起伏相关性

根据上部分“中澳双边关系起伏与中澳经贸变化相关性”的论证模式，如果世界经济形势的起伏大大影响了中澳经贸的变化，那么论证即成立。本文先采用特殊年份的例证来说明，接着会再用定量分析进行补充验证。

在验证这个假设之前本文可以从澳中贸易增长率曲线图和世界经济增长率曲线图来直观预测两者的相关性（见下图）。两个图标横轴都是 1991-2011 年，纵轴上是增长率，分别取了不同的值域范围，从图上能明显看出两者发展趋势有着高度的重合。于是可以继续下面的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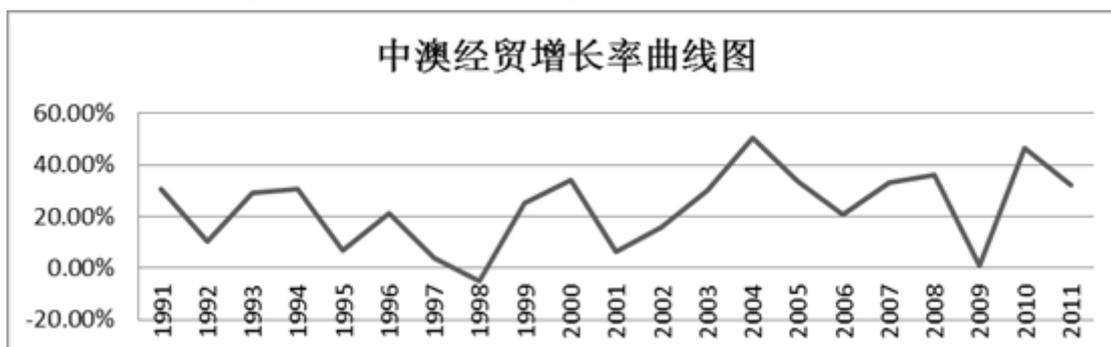


图 1 1991-2011 中澳经贸增长率^[1]

^①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澳大利亚-双边政治关系回顾”整理得出：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dyz_608952/1206_608954/sbgx_608958/

^② CORREL 函数的相关系数取绝对值：R<0.3 为微弱相关；0.3≤R<0.5 为中等相关；0.5≤R<0.7 为显著相关；R>0.7 为高度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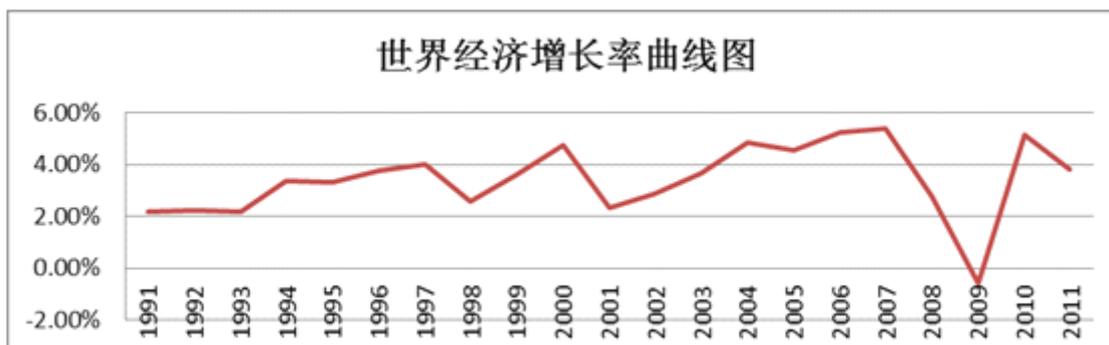


图 2 1991-2011 世界经济增长率^[2]

1. 例证分析

由表 1 数据可得，1991-2011 年中澳经贸增长率低于 10% 的年份只有 1995、1997、1998、2001 和 2009 年，这四个年份都是中澳经贸增长率曲线上明显的转折点，从它们出发来考察宏观经济形势是如何影响中澳经贸状况的。

在本文取样的 1991 到 2011 的这段时间内，众所周知世界经济有两个重大的波折，分别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事件爆发与对经济形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本文需要考察的相应的经贸数据应该是 1998 年和 2009 年的数据，1998 年世界 GDP 增速为 2.58%，较 1997 年增速下降了 35.66%；2009 年世界 GDP 增速为 -0.57%，是世界经济 20 年来首次的负增长，此次危机爆发于 2008 年，下滑趋势直到 2009 年才探底（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检索整理得出，附表略）。

除了两次明显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低值外，在图表上本文发现了 2001 年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增长率较 2000 年下降 50.6% 为 2.35%。通过背景资料的调查得知：2001 年世界经济的放缓是经济规律的周期性作用，因为在此之前，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已经持续增长了近 10 年（除 1993 年外）。^①这次调整伴随着网络科技为主的“新经济”泡沫的破灭，当然也有 9·11 事件的短时间的冲击。

标志出了世界经济低潮的 1998、2001 和 2009 年之后，同时对应地寻找相应年份的中澳经贸增长率数据值，分别为 -5.15%、6.44%、0.72%，这四个数值都低于相应时期中澳经贸增长率的平均值，并没有出现例外。

至于 1995 年中澳经贸增长率的低值，本文认为其原因也并不是政治性的，通过对 1995 年中国和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的查询发现，1995 年中澳双方的 GDP 增幅都出现了明显放缓：中国由 1994 年的 13.08% 下降到 1995 年的 10.92%；澳大利亚由 1994 年的 4.2% 下降到 1995 年的 3.23%。^②因此认为宏观经济形势变差导致中澳经贸下降的可能性更加可靠。

2. 定量分析

例证支持之后，本文进而更全面地用相关性分析函数 CORREL 来分析这一时期中澳经贸增长率和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具体得到的结果：1991-2011 年计算结果是 0.576，为显著正相关；2000-2011 年计算结果为 0.749，高度正

^① 《连续增长近十年 美国经济能否避免衰退》，《南方网》，2001 年 2 月 26 日，<http://finance.sina.com.cn/d/38899.html>

^② 数据来源：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检索整理得出。

相关。因此本文可以肯定地认为中澳经贸变化与世界经济形势起伏是存在很明显的相关性的。

中澳经贸与世界经济之间的显著相关性是其政经关系的特征，其是否存在特殊性关系到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否有价值。如果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双边贸易都存在着与世界经济趋势高度的相关性，那么本文的发现可能价值不大。于是本文进一步对于中日和中美经贸增长率（根据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 UNCOMTRADE 相应数据整理得出，附表略）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 Excel 软件取 CORREL 函数，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中日为 0.356，为实中等正相关；中美为 0.188，为微正相关。这两国的数据都远远低于中澳之间的数据，本文因此可以推测中日、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影响因素不仅仅只有世界经济大趋势，而受到了其他非世界经济因素的干扰，因此增强了本文对于中澳政经关系特殊性的论证。

三、中澳政经合作——洛克文化下的选择

在建构主义和洛克文化的大理论背景下，本文的分析路径借鉴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和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的取向，分为结构层次和单元层次两个层次来具体解析中澳政经合作体现出来的洛克文化的事实。

结构层次的考察：从国际体系的变动是如何拥有社会化的效应来影响中澳两国，而中澳两国又以怎样的方式来各自适应国际体系的变动，从而在其中找到自身相对于国际体系来说合适的身份。

单元层次的考察：侧重于中澳之间如何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如何相互认知、相互适应，并在此过程中找到自我相对于他者的合适身份。

（一）结构层次的考察

国际体系的变迁考察一个力量因素和一个观念因素，力量因素指的是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的国际体系变动，这其中最明显就是发达工业国家增速的放缓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高速成长；观念因素指的是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深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国际制度的普及，其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建构及强化世界体系洛克文化的角色。

1. 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建构

首先，中国政府官方接受并传播合作的价值观。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的敏锐观察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重要论断。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①在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江泽民重申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判断，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同时认为“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②2005 年 9 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上，郑重地向国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1 月，第 4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 年 6 月，第 37 页。

际社会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① 2007年11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安全等四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如何构建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问题。同时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②

其次,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当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后,中国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和各种条约,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已参加了约80%的国际组织,^③中国迈入了国际组织高参与度的国家行列。在国际多边公约的参与方面,1949-1979年的30年中,中国仅加入了34个国际条约,而在1979-2004年的25年间,中国共加入了233个。^④

再次,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不断内化、习得国际制度和规范。特别在人权领域逐渐与国际人权标准接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开始积极主动地参加国际人权活动,并已经与近20个国家开展了人权对话与交流。1991年11月,中国政府发表了首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实践。到2010年,中国先后共发表了9个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已参加27项国际人权条约。^⑤

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对人民币实行贬值,并通过国际机构和双边援助来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这一历史性的贡献得到了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这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构建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受害者心态”,在改革开放仅20年之后就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对如何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认真思考。

2. 澳大利亚：“中等强国”的外交之路

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诠释早在二战结束之初就有,1945年联合国国际机构大会在旧金山召开,澳大利亚外长赫·维·伊瓦特(Herbert Vere Evatt)抱着推进澳大利亚利益的决心参加会议,首度采用并推动了被称之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中等强国”策略。^⑥在其担任外长的九年间,奠定了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的基本特征,即在保持与西方同盟关系的同时,善于运用多边机制来参与国际关系议程,保持灵活的外交行动空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之路迎来中兴时代,其中最良好的开始就是关于亚太多边合作机制上的成功。霍克总理于1989年1月访问韩国时,率先提出了建立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论坛以促进该地区在服务业、旅游业和直接投资等问题上的深入发展的建议。在霍克总理的积极推动下,首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于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召开,从而开创了“亚太经合组织

^① 《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05年9月1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6/content_3496858.htm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引自新浪新闻中心,
<http://news.sina.com.cn/c/2007-10-26/102412791115s.shtml>

^{③④} 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版,第347页。

^④ 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一览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jg/tyfls/tfsczkzlk/zgcjddbty/t70814.htm>

^⑤ 《中国人权事业改革开放后获突破性进展》,中国新闻网,2011年9月8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9-08/3316633.shtml>

^⑥ C.Ungerer, “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2007, Vol.53(4): 540

(APEC)”机制。其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埃文斯(Gareth Evans)也是“中等强国”外交路线的有力实践者。在其领导下,澳大利亚率先提出了包括保护南极环境、促进柬埔寨和平、军控与裁军等一连串的诉求明确、引人关注的外交政策,由此也获得了国际社会成员广泛的赞许和支持。

到了陆克文执政时期,他并不满足于传统上工党“中等强国”的外交定位,强调澳大利亚以“首创精神”开展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①值得一提的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坚持美澳同盟基础上,谋求外交的“独立性”。2007年12月4日,陆克文上任之日即批准《京都议定书》(the Kyoto Protocol),这使得美国在气候问题上受到国际孤立,成为唯一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在巴厘岛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上,他敦促所有发达国家共同努力来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又明确表态指出“美国在目前的国际气候问题解决方案中是局外人”^②,塑造了澳大利亚在气候问题上的独立立场和道义正确性;二是以先动谋主动,以“首创精神”谋“领导地位”。2008年6月4日,陆克文在悉尼向亚洲协会“澳亚中心”演讲时提议在2020年前成立“亚太联盟”(Asia-Pacific Community),吸收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美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参加。^③地区机制的主导权是增强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手段、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陆克文“富有创造力中等强国外交”就突出体现在其一整套大胆的“亚太机制”理念上。

澳大利亚作为二战以来主张“中等强国身份”的典型国家,其外交行为特征倾西方化是非常明显的,从来没有丝毫怀疑美国作为世界强权国家的领导地位,在追随美国的同时选择了符合自身国家实力的“中等强国外交”实践之路。澳大利亚乐于扮演在国家争端中的协调者、乐于制定新的国际议题来弥补自身国家实力不足的缺陷,以此最大化地谋求本国利益。

(二) 单元层次的考察

中澳近二十年的交往无论在横向上或者是纵向上都有长足的发展,中澳两国政府首脑几乎每年都会以不同形式进行会面,高层交往的数据更是难以精确统计。这些不同形式、不同深度的互动或许会被认为是流于形式、交流得多而实质性成果少,但这便是进程的社会化的意义,其对于促进规范的理解、集体身份的建构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 多边机制下的互动

中国与澳大利亚都是亚太地区对话与合作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双方除了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强合作外,也在一些地区性的国际组织中寻求对话和合作。这其中就包括了代表性的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和二十国集团。

以上组织中与中澳合作渊源比较深的当属亚太经合组织,它是中国参加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政府间区域经济合作组织。1989年组织成立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加入。之后澳大利亚便积极劝说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这个由自己发起的覆盖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1991年中国的加入无疑提高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影响力。特别在1993年,当时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美国提议,在例行的部长级后加入一项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这使得经济合作组织带有更大程度的政治色

^① 唐小松、宾科:《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第14页。

^② K. Rudd, Speech at the Bali Conference.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vailable at: <http://www.alp.org.au/media/1207/spepm120.php> > .12 December, 2007

^③ M. Franklin, “Kevin Rudd to Drive Asian Union”, *The Australian*, 5 June 2008.

彩。于是在当年的基廷总理访华时，便主动劝说中国参加这历史上的第一次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最终江泽民主席出席了这次会议，澳大利亚对此感到非常满意。^①

从1993年至今中国均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个多边机制的存在是中澳双方首脑年度会见的一个重要保障。中澳两国领导人不失时机地利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晤，针对热点问题交流看法，同时中国也从与澳方接触中得以重申中国对台政策的一贯立场，也由此获得澳方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96年台海危机，新上任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跟随美国政策对华强硬导致中澳关系紧张倒退，但双边关系的转机就发生在1996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期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进行了会晤，双方首脑当面清晰地交换了彼此的态度看法，澳大利亚重申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和支持中国加入WTO的态度，缓解了紧张局势。

类似的例子还体现在东亚峰会中。东亚峰会是年度领导人会议机制，从2005年召开至今已过七届，每一年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都参加了会议。2009年中澳之间由于澳大利亚新版国防白皮书、中铝收购力拓被拒、允许热比娅访澳等负面事件的接连发生，中方主动暂停和推迟高层的交往，中澳关系降到冰点。然而转机就在2009年10月东亚峰会上，温家宝与陆克文邻座参会并举行正式会见，会后双方关系恢复正常，两国媒体间的互相指责也逐渐平息。

二十国集团(G20)由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于1999年倡议成立，最初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升格为领导人峰会，至今7次领导人峰会胡锦涛主席都应邀出席，并在与会期间同澳总理简短寒暄、增加交流。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峰会上，面对国际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趋势，作为G20全球金融机构改革工作小组共同主席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呼吁，增加中国在IMF中的发言权。^②这一举动被澳本国媒体认为是“亲中”的又一表现，同时也有惹恼美欧等IMF传统主导国家的危险。

2. 双边机制下的互动

中澳政治互动不仅有多边场合的助力，同时双方本身也致力于建立更完善的双边直接对话机制，拓宽合作领域、增加政治互信。重点涉及了双边高层交往、经济合作、人权对话、军事磋商等领域。

1997年3月霍华德对中国进行任内第一次访问。双方商定中澳双方应建立起“每年召开一次两国副部长级经贸联委会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的对话机制。同一年的8月澳大利亚政府就人权问题和中国展开对话，并建立了双方副部长级的人权对话机制，规定每年召开一次。至2012年已举行十四次。中澳建交后人权问题一直是双方外交关系中的主要障碍，在此问题上中澳双方从敌对到合作的互动也显见中澳关系既合作又斗争的本质。

1998年2月，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委员迟浩田应邀访问澳大利亚。这是中国军方高层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双方就定期进行部长级磋商达成协议。至2012年已举行十五次。这表明中澳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进展到军事和安全的“高级政治”的敏感领域。

^① 汪诗明：《全面深化的中澳关系》，《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29页。

^②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呼吁增加中国在IMF发言权》，搜狐新闻，2009年3月24日，<http://news.sohu.com/20090324/n262965905.shtml>

1999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访澳。中澳双方同意在加强两国现有对话与磋商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中澳两国领导人以及两国外长之间一年一次的定期会晤机制。这是对 1997 年定期会晤机制的加强。

2006 年温家宝总理出访澳大利亚，期间双方建立了新的一项高层经济对话机制——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与澳大利亚联邦副总理兼贸易部长韦尔共同主持召开了“中澳高层经济合作对话机制”的第一次会议。至 2012 年已举行四次。

2007 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双方商定建立“中澳战略对话机制”。这表明澳大利亚不仅仅着眼于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更希望携手中国在亚太以及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加强沟通协作。至 2012 年已举行三轮。澳大利亚作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此类战略对话的国家，可见中国对中澳合作的重视。

2011 年 4 月，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访问澳大利亚，两国外交部正式签署了关于建立中澳论坛的谅解备忘录。“中澳论坛”是由中澳两国政府建立的非正式高层论坛，主要邀请两国政界、商界、学术和媒体界代表人士就涉及中澳关系的广泛议题交换看法。2011 年在澳大利亚首次举办。

四、结语

在中澳关系上，似乎经贸关系一旦建立便会独立于双边关系的存在而发展出自身的规律，这一点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中澳政经发展状况上得到更加明显的证明，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在面临政治与经济利益两难选择的时候都会采取一种适当的手段来保护经济利益。因此，梳理近二十年的中澳关系发展，政治方面波折不断，而与此同时的经贸发展则呈现出一幅与双边关系迥异的图景，中澳经贸整体上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期间录得低于 10% 增长率的年份为 1995、1997、1998、2001 和 2009 年，这些低值年份与双边关系的波折年份并没有直接对应关系，这便是中澳政经合作上的显著特征。

中澳日益增强的贸易纽带“似乎”在改变国家外交选择，而外交选择变化的背后是观念在起作用，因此中澳政经合作模式上的特征采用建构主义视角来看待似乎有更大的解释能力。中澳关系目前是一种以竞争对手为主要概念的洛克文化，因此在没有重大国际体系冲击的情况下，双边关系常态便会是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情形，这样的解析便能在纷繁的中澳交往史实中看到其本质。